

戰時民衆訓練小叢書

戰時文化運動

陳高備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戰時民衆訓練小叢書

陳高備編著

戰時文化運動

正中書局印行

第一章 全民抗戰與文化運動

古人說：「兵凶戰危」，又說：「唯兵不祥」。的確，無論任何時代與任何地方的戰爭都是一種極端破壞的工作，人民所受的影響都是一種極其流離顛沛的生活，所以任何民族國家一旦遇了戰事，要想自衛安全，要想求生存，乃至要想求得最後勝利，當然惟有奮武力來與敵人搏鬥，那裏還能再談到文化。但是事實上所謂戰爭並不是這樣簡單的一件事情，把戰爭僅看成是武力的搏鬥，在野蠻時代部族與部落的戰爭或許是這樣，若在今日世界上國家與國家的戰爭却絕不是這樣單純。因為近代的戰爭是全民族的戰爭，而不僅是軍人的戰爭；是科學文明的鬥法，而不僅是前線將士的肉搏；是意識思想的對立衝突，而不僅是戰場上的殺人流血；質言之，不僅是「武化」的戰爭，而尤其是文化的戰爭。因此我們這



次抗戰發動以來，雖然全國的軍隊都已經是動員了，我們若要爭取最後的勝利，更需要全國的文化分子總動員起來從事廣大的文化運動。

近代戰爭既是全民族的戰爭，而不僅是軍人的戰爭，那末我們在這次長期抗戰中，除全部軍隊動員外，更應當發動全體民衆動員。要發動全體民衆的動員，第一必須喚起民衆的抗戰精神，第二必須使民衆的抗戰精神團集一致，第三尤須使民衆的抗戰精神能維持長久。這樣才能算是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作到長期的抗戰，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所以魯屯道夫（Ludendorff）在其所著全民族戰爭論中說：「一國之國防力，植根於其民族中，國防力爲民族中之一種成分。視其民族之物理力、經濟力及精神力之大小而全體性戰爭中之國防力之大小以定。其中尤以精神力爲重要，所以使民族武力一致團結者爲精神力，所以能在爲爭民族生存之全體性戰爭中支持日久者視其精神力。此類戰爭非今日始而明日終，可以遷延至極長之年月。今日世界上任何國家，咸知軍備與軍人教練、軍人武裝之不可缺，然所以決定其爲民族生存之戰爭之勝敗則視此精神力。惟此精神的一致團結，然後其國

民對於前方軍隊常有新精神力之灌輸，且爲國防而工作，而能在極艱難之戰爭中與夫敵方之攻襲中，尙存有戰勝與克敵之決心。就平日言之，精神的一致團結在國防力中占有特殊地位尙非難事，惟在動員之日，官員與兵士由休假而返至隊中者數百萬人，則其精神團結已不如平日之堅強，同時全國民之精神狀態亦因之退步，而軍民心理相互之影響，交流而爲一。戰爭時間愈延長，則精神團結之動搖亦愈甚，除非前方勝仗消息傳來，可以鼓舞人民與軍隊之勇氣外，其精神上必有難以維持之勢矣。」（波譯全民族戰爭論十一頁）魯屯道夫的話是在歐洲大戰親身血戰的經驗談。我們這次抗戰雖然目前還沒有像歐洲大戰那樣激烈，但是在歐戰以後二十餘年的今日，戰爭的性質已比歐戰更爲現代化了，而戰事的結束亦恐比歐戰還延長，甚且說不定因此而牽動各國，引起世界的大戰，亦未可知。所以我們全體人民決不能把全部戰爭的責任祇付託給前線的將士即算了事，必須全體人民一致奮起，直接間接都參加到抗戰的陣線中，然後算是盡了國民的職責，然後才能得到勝利的把握。但是事實上我們的抗戰發動以來已經三個月了，而後方的民衆的動員還不過是一少部

分，就是所謂一少部分已經參加到抗戰中的民衆，亦還不免因工作上偶然遇點困難或前線上偶然有點小小挫折，就發生懷疑動搖的念頭；因此真正能夠勝不驕，敗不餒，埋頭苦幹以期最後勝利的、簡直可說少之又少。這樣如何能夠說是全民抗戰，至多不過是全軍抗戰。所以我們現在應當趕快覺悟，此次抗戰如不欲求得最後勝利，則根本不應發動戰爭，讓我們的敵人蹂躪吞滅我們的民族國家就算了事；如果不甘滅亡而要想爭求最後的勝利，那末軍事的抗戰已經是充分表現出來了，以後的問題，就要看我們全體民衆的動員如何。我們要想把全體民衆動員起來，非到民間作廣大的宣傳不可；我們要把全體民衆的精神團結一致，也非作深切的宣傳不可；我們要使全體民衆都能勝不驕，敗不餒，永遠維持到底，更非時時對民衆作宣傳教育的功夫不可。這種宣傳工作應由甚麼人來擔任？那當然是文化分子來擔任了。所以我們可說，抗戰的勝利在乎全民動員，而要全民動員，那末文化界必須首先動員。

近代的戰爭既是科學文明的鬥法，而不僅是前線將士的肉搏，所以戰爭的勝負，全看

國家科學文明的發達程度而定。近年來日本人所以能在中國橫行無忌，爲所欲爲者，很明顯的是因爲他們的國家在科學的路程上比我們早走了幾十年，所以論人民的衆多他們不及我國，論土地的廣大他們不及我國，而他們祇拿上一件科學文明的法寶，便想壓倒一切，吞滅世界了。不料中國雖然科學比較落後一點，但是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亦惟有拿上了「聖挺以撻利兵」的精神來做一個誓死的抵抗。這樣一來，敵人雖憑恃數十年來所得的一點科學文明，想一口把中國吞下去，亦不能不受一個極大的打擊。但是現代的戰爭究竟不是「聖挺以撻利兵」的時代了，中國的科學文明雖然比較落後一點，亦究竟不是根本沒有。所可惜的是一班科學人才平時爲種種不良的環境埋沒，無機會使其發展，以致學無所用，因而使國家的科學文明無從發達起來。好，現在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抗戰，一切社會上的不良環境被戰爭的空氣打破了，科學家成爲事實上最重要的人物了。無論前線或後方處處都需要多數的科學家來工作；如前方的軍械、運輸、防禦工程、救護、送藥當然是離了科學家不行，卽後方的生產、存儲、流轉、調劑、節縮等事亦必須科學家來處理。所以我們

在此次抗戰中，一方面應當發動所有的科學家盡量參加到前方或後方去工作，一方面更應當積極培養新的科學家繼續起來，以供長期抵抗的需用，而且更應當乘此科學戰爭之時，普遍的對一般民衆實行科學化的運動，以求通俗科學知識的普及。這些事情便都需要文化界來宣傳，這些工作，也就是文化界的工作。因為科學家本來是文化界的重要分子，所以科學家的活動，亦就是文化的運動。

近代戰爭既是意識思想的對立衝突，而不僅是戰場上的殺人流血，所以有形的決鬥都是由無形的矛盾而來。例如這次中國對日本的抗戰，表面看來，當然是因為日本軍閥窮兵黷武，侵略中國，以致中國忍無可忍，不得不用武力來解決，這似乎完全是軍事上的衝突；但是若從裏面來看，就可知日本的暴力侵略和中國的武力抵抗，都是由兩種不同的意識思想多年的對立衝突而生，即由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侵略主義與和平主義，法西斯帶思想與民主思想，獸性意識與人道主義的對立衝突而生的。從近年來中日交涉的歷史上來看，很明顯的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的行為完全是帝國主義、侵略主義、法西斯帶思想與獸

性意識的極端表現；反之，我們中國的處己待人之道，却完全是站在民族主義、和平主義、民主思想和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因為在意識與思想上根本是處於對立矛盾的地位，所以日本軍閥對於我們國家近年來自力更生、埋頭建設的各種行爲，無論如何，總是不加體會，不能瞭解，輕則造謠誣蔑，重則橫肆暴虐；不祇是要侵佔我們的國家領土，而且是要消滅我們的民族意識。所以平常時期藉口親善政策而竭力壓迫我們的救國言論，戰事起後則不惜用極野蠻極殘酷的手段轟炸我們的文化機關，屠殺我們的愛國人士。但是人類的思想不是用野蠻手段可以干涉的，亦不是用武力政策可以消滅的。所以敵人愈用帝國主義、侵略主義、法西斯蒂思想與獸性意識對待我們，我們的民族主義、和平主義、民主思想與人道主義愈加發達，愈加堅定。因此，自從敵人窮兇極惡，對我們用暴力侵略以來，我們的民族國家反而有了一種新氣象了：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觀念，已經是把平日的各黨各派都溶化成一條很鞏固的抗敵陣線了，民主思想的奔騰澎湃已經是把封建殘餘勢力壓迫得不敢出頭了，而我們一切行爲上所表現的和平主義與人道主義已經是世界各國共同承認了。這

樣看來，敵人的野蠻侵略與我們的正義抵抗豈不是很明顯的兩種不同的思想戰爭嗎？思想的戰爭，無論在任何時代，結果總是前進的思想佔優勝，而落後的思想歸失敗。大家都可以知道：帝國主義、侵略主義、法西斯蒂思想與獸性意識在時代潮流上已是落伍的思想；而民族主義、和平主義、民主思想與人道主義則正是站在時代潮流的思想前驅；那末，我們祇要認清我們的思想立場，鞏固我們的思想陣線，則可正如古人所說「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最後的勝利當然是屬於我們。但是這種道理絕不是一般普通民衆所能認識，一般普通民衆雖然覺着中國這次對日本的抗戰和以前的內戰性質不同了，然至多不過知道這次戰爭不是像以前中國人自己相打，而是中國人打外國人了，打仗當然還是槍砲炸彈的相打，他們那裏還知道有甚麼思想上的戰爭。等而上者即稍有知識的分子，雖然亦知道這次的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矛盾衝突，雖然亦知道我們的和平主義、民主思想、與人道主義是合乎時代潮流的，而敵人的侵略主義、法西斯蒂思想與獸性意識是違背世界公理的；但是他們總以為戰爭完全憑的是武力，那裏能憑國民的思想決定勝負。即再等

而上者夠得上所謂知識分子的人們，雖然明瞭國民的意識思想在近代戰爭上的重要關係，而且亦深知這次中國對日本抗戰，從國民的精神表現上看來，中國確是把握住一個勝利的基本條件了；但是因為他們信道不篤，因之前線戰事稍有挫折，即不免對於自己的認識發生懷疑與動搖，甚且或至根本打消了自己所有的認識。因此我們可以說事實上我們的國民思想在這次抗戰中確是比日本的軍閥的思想佔到優勝的地位，但是如何把不知道這種道理的一般普通民衆使他們知道，把已經知道這種道理的人們使他們堅定信念，則非有觀念正確與信仰堅定的前進分子領導起全體文化界來作長期的廣大宣傳不可。

現在對暴日的抗戰已經是發動了，這一次的戰爭是我們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非爭求最後的勝利不可，要爭求最後的勝利，則非喚起全體人民，堅定抗戰精神，運用現代科學不行；而這一切很重要的工作都可說是文化界的責任。我們不要把文化運動看成是「誦孝經而退黃山」的事情！

第二章 戰時文化運動的主要使命

全面抗戰發動以來已經是三個月了，各地文化界的人士亦差不多都已經各就自己的能力所及而參加到抗敵陣線中了，在這三個月的工作期間，我們不祇是證明了抗戰期中文化工作的急迫需要，而且把我們從事文化工作的使命與目標，亦由客觀的經驗使我們更加認識清楚了。因為我們在平時，雖然有不少的人，常常喊着文化運動，但是紙上空談，總不免流於玄虛空想不合事實之弊；即在抗戰初發動的時候，因為人民突然遇到一種非常事變，亦不免有感情勝過理智的現象；所以近年來平時的文化工作，固不免使人有「誦孝經而退黃山」之感，就是抗戰初發動時，許多文化人的工作，亦還沒有能把握住一個正確扼要的目標。現在我們已經是正式走入一個極嚴重的非常時期中了，我們的非常時期生活，

已經是度過兩三個月的時間了；因此許多急迫需要解決的問題，早已是很顯明的擺在我眼前，而其他不急迫的問題已經不能再使我們注意；感情的衝動漸漸減少，而理智的判斷漸漸正確了；於是到了此時凡從事文化工作的人，由兩三月來的實地經驗，對於抗戰時期文化工作的使命與目標，差不多有了一個共同的認識了。這個從實地經驗中大家所得到的共同認識，就是戰時文化運動的原則，我們要負擔文化工作的使命，惟有照這個原則去工作。

所謂戰時文化運動的原則是甚麼？我們可以分積極與消極兩方面來說：

積極方面就是要加強國民的民族意識。所謂文化工作無疑的是一種意識上的工作，而此次對暴日抗戰則是爭求民族生存的一種工作，所以無論何人，都不能不承認此時最需要者，即為全體民衆的民族意識。近代的戰爭，不僅是一種軍事上的戰爭，而實在是一種思想上的戰爭，所以這次暴敵對我們的野蠻侵略，亦不僅是祇要佔據我們的領土，而尤其是要消滅我們的民族意識，這我們祇要看敵人對我們的抗日言論之忌恨，與對我們的文化機

關之毀滅，以及對我們愛國青年之仇殺，便足以作爲很好的事實證明。兵家說：「攻心爲上，攻城次之，」敵人的野蠻行爲，其目的正是這樣。那末我們就能夠聽他消滅我們的民族意識嗎？不能！古人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們的土地儘管因一時軍事上的小挫而有點損失，我們的將士儘管因長期的抵抗而有點犧牲，而我們的民族意識則應當隨抗戰的發展而更加強，質言之，卽我們的抗戰意識應當因敵人的暴虐而更加強。本來凡是一個現代國家的人民，都是民族意識支配他們的行爲，但是中國因爲還沒有正式完成一個現代的國家，所以雖然近年來人民對於「國家」「民族」等名詞不大生疏了，但是還有許多人民，是根本沒有形成一種民族意識，於是墮落的人們說，「國家事管他娘，」落後的民衆說，「誰家坐了天下，還不是當老百姓，」而一些有錢的闊老們則以爲買外匯，住租界，便可以永享安樂之幸福了。這些人在平時無論如何以國家民族的觀念灌輸他們，他們亦是不能接受的。好！現在有很顯明的事實使他們看：同樣一塊土地，今天插的是青天白日旗人民便可平安生活，明天若是插上太陽旗，人民就得遭蹂躪屠殺。這種事實上的指示

，可以勝過多少的演說。所以我們在此時要加強人民的民族意識，不祇是急迫需要的事情，而且亦是容易作到的事情，因為一個人如果不是甘心作漢奸，甘心作亡國奴，事實的逼迫使他們無論如何不能不動一點國家民族的觀念。文化人便應乘此時機作廣大的宣傳，把沒有民族意識的人，使他們有所覺悟，把已有民族意識的人，使他們更爲加強，使人人都有了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觀念，然後才能作到真正的全民抗戰，使全體人民的民族意識加強，然後可以維持長期的抗戰，人民的精神與軍事的武力打成一片，然後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這就是戰時文化運動的重要使命，也就是戰時文化人的首要工作。

文化工作的使命積極方面，是要加強民族意識，消極方面，便是要肅清漢奸意識。全面抗戰起後，我們知道前線的將士，固然每日在那裏流血殺敵，以保衛我們的國家民族，但是一班喪心病狂，爲虎作倀的漢奸，亦是到處大有人在，這已經是成爲我們抗戰期中人所共憤的事實了。但這還是指那些有行爲表現的漢奸而言，此外更足使我們可怕的則是雖沒有漢奸行爲而却有漢奸意識的人，這種無形的漢奸，更是抗戰前途的極大障礙。有行爲

表現的漢奸，我們當然可用國法來處決，祇有漢奸意識而無漢奸行為的人，我們便不能用法來處決，但是亦不應當讓其自由蔓延，遺害國家民族，於是這種工作便不能不由文化人員負責了。所謂漢奸意識包括很廣，如個人主義、封建思想、割據思想、享樂主義、苟安心理、調和態度、敗北主義等都是，總之，凡不願意參加抗戰陣線而反足以妨礙抗戰工作的態度，我們都可以毫不客氣的名為漢奸意識。我們對於這種漢奸意識，一方面應當促醒他本人的覺悟，一方面又要極力揭露其危險性，使別人不要受得傳染，這便需要很好的宣傳工作了；這便需要文化界的人士努力了。

以上所舉的兩個工作目標，可說是戰時文化工作的主要使命，我們祇要把握住這兩個工作目標，一切具體工作，儘可以因時因地因人而不同，而目標則可以共同集中於一處，功效亦可以容易收穫了。

第三章 戰時文化界的總動員

在全民抗戰期中，文化界要想發揮他的能力，完成他的使命，第一步的工作便需要把全體文化界的分子總動員起來。

所謂文化人大概都可說是知識分子。平常因為知識分子大概都是從事個人的研究、個人的著作、或個人的其他各種職業，所以很少有聯絡的關係；而又因為知識分子大概都是理智發達、個性伸展，所以雖有一點聯絡的關係，亦多半是偏於友誼的成分，而不足以言集團的組織。這種友誼關係的聯絡，在平時固然可以得到切磋琢磨的功效，幫助個人的自由研究，自由著作或自由從事其他各種職業；但是到了戰時要應付非常時期的局面，從事非常時期的工作，便不免有渙散凌亂的缺點。所以在抗戰期中要使全體文化界的分子都動

員起來，第一步便需要把文化人都組織起來。因為戰時的一切工作都是戰鬪性的工作，文化工作當然亦不能例外，而戰鬪能力的表現如何，則全看戰鬪人員的組織如何。

文化人的集團組織成功之後，便須作出一個切實的文化工作綱領，分配給各部文化人去實行。所以要在戰時把全體文化界的分子動員起來，第一步是組織的問題，第二步便是工作的問題。我們知道文化分子是最好高談闊論而不願意實際工作的，在平常的時候，有甚麼團體產生總是開會演說之後，把招牌掛出在報紙上發表一段新聞，就算了事，假若到了戰時，文化人的組織還是這樣，那就不如不組織還可以省得許多麻煩。所以我們說：文化人的集團組織成功之後，便應當趕快作出一個文化工作的綱領，分配給各部文化人去實行。因為惟有在工作的推進中，才可以使組織鞏固，亦惟大家都參與實際的工作，才可以夠得上說是全體動員。

從以上所說看來，戰時文化界的動員，第一需要有集團的組織，第二需要有具體的工作，以下我們便把這兩件事情來作一個詳細的分說：

第一節 戰時文化界的組織

(甲)組織原則

- (1) 要把全國文化界的分子成爲一個集團，而這個集團又要成爲一種有機的組織。
- (2) 全國的組織要有一個完整的系統，但因客觀的環境亦可因時因地而使其能有伸縮性。
- (3) 要盡量利用平時已有的文化團體，不必根本把平時所有的組織完全推翻。
- (4) 要把性質相同的團體，歸併成一個組織，不要重重疊疊弄下許多名異而實同的團體。
- (5) 要使組織盡量民主化，但不可流爲個人自由主義的形態。
- (6) 縱的關係要盡量使其系統化，但不可流爲官僚主義的衙門形式；橫的關係要盡量使其發生密切的聯絡，但不可越俎代庖成爲紛雜的現象。

總之，在組織原則上，我們要注意戰時的特殊使命，環境上的特殊需要，與文化分子的的特殊性質，然後能把全體文化人組織成一個有機的集團。文化人是最不容易組織的，別人來組織他們固然是有所不能，就是他們自動實行組織，亦不能像其他團體之容易進行。所以在組織原則上應特別注意，在原則上能夠注意周到，然後可以談到進行的方法。

(乙)組織方法

組織方法可以分爲三種：

(1) 先將已有的各種文化團體加以一番改組或充實起來，將平時沒有團體而在戰時需要組織的文化部門盡量使他們自動組織起來；然後再由這些文化團體各推幾位代表作一個文化界的總組織。例如都市中平時已有教育界的團體、新聞界的團體、出版界的團體、文藝界的團體等許多組織，此時便應當竭力使其充實起來；如果是平時雖有組織，而分子渙散，負責無人，則應當加以一番改組；又如科學界及藝術界平時即有幾部門的人員沒有團體的組織，而這些人員又確爲戰時急需的人

材，便應當趕快自動組織起來。文化界的各部門人員都有了他們的基本團體，然後再由各基本團體中推出代表共同成立一個總的文化團體，則這個總的文化團體可以成爲一個最民主化最有力量的機關了。

(2) 如迫於時勢，文化界各部門的基本組織，短時間內不能組織完備，則可取從上而下的組織辦法，先由各部門的領袖人員成立一個文化界的總組織，然後再由總組織中派人成立各部門的組織。

(3) 如因時代的需要很急促，從下而上的組織辦法與從上而下的組織辦法都趕不及從容進行，則可一方面由各部門的領袖人員成立文化界的總組織，同時一方面並由各部門的人員進行各部門的組織，雙方並進以應急迫的需要。但這種組織辦法最易發生紛亂矛盾的弊病，故非在萬不得已時不必這樣辦理。即在萬不得已時要採用這種辦法，亦須把總的組織盡可能的使其完善。因爲總的組織如能完善，則各部門的組織雖有毛病還不至影響全體。若總的組織不能完善，則祇要有幾個部門

的組織發生凌亂的現象，便可以影響到整個文化界的工作。

以上三種方法，當然第一種最好，第二種次之，第三種更次之。但是在非常時期有時不能照第一種方法從容辦理，故第二種方法與第三種方法亦可善為運用。

(丙)組織系統

組織方法已如上述，組織系統更宜注意。關於組織的系統，我們覺着自從抗戰發生以來，即全國文化中心的上海文化界亦還沒有弄好，所以同樣性質的文化團體產生了許多，既沒有縱的關係，亦沒有橫的聯絡，而有些文化部門則至今還沒有成立組織。上海如此，內地不問可知。所以我們覺着要使文化界成爲一個有機的組織，對於組織系統不能不加注意。現在要談文化界的組織系統，我們即以目前所有的組織形式及名稱爲根據，而加以補充，使其更加系統化可矣。

(1)各地文化分子的總組織：

文化界救亡協會（上邊應冠以地名，如上海市、江蘇省等）。

(2) 各部門文化分子的組織：

1. 出版界救亡協會。
2. 新聞界救亡協會。
3. 著作家救亡協會。
4. 教育界救亡協會：
 - a. 大學教職員救亡協會。
 - b. 中學教職員救亡協會。
 - c. 小學教職員救亡協會。
 - d. 社會教育人員救亡協會。
5. 社會科學家救亡協會：
 - a. 政治學者救亡協會。
 - b. 法律學者救亡協會。

- c. 經濟學者救亡協會。
- d. 史地學者救亡協會。
- e. 教育學者救亡協會。
- f. 心理學者救亡協會。
- g. 社會學者救亡協會。
- h. 其他。
- 6. 自然科學家救亡協會：
 - a. 理化學者救亡協會。
 - b. 數理學者救亡協會。
 - c. 機械學者救亡協會。
 - d. 土木工程學者救亡協會。
 - e. 醫學家救亡協會。

- f. 藥學家救亡協會。
 - g. 地質學者救亡協會。
 - h. 天文學者救亡協會。
 - i. 農學家救亡協會。
 - j. 其他。
- 7. 文藝家救亡協會。
 - 8. 戲劇界救亡協會：
 - a. 劇作人救亡協會。
 - b. 話劇家救亡協會。
 - c. 國劇家救亡協會。
 - 9. 電影界救亡協會。
 - 10. 游藝界救亡協會。

11. 繪畫家救亡協會：

a. 西畫家救亡協會。

b. 國畫家救亡協會。

c. 漫畫家救亡協會。

12. 音樂家救亡協會。

13. 學生救亡協會：

a. 大學生救亡協會。

b. 中學生救亡協會。

c. 小學生救亡協會。

把以上這個組織系統的計劃，來配合到上海目前已經實行的組織系統中應當是這樣：

1. 最高機關為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

2. 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屬於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之下。

3. 文化界各部門的救亡協會又屬於文化界救亡協會之下。

4. 文化界各部門的救亡協會之下，視人員之多少與環境之需要再分設各科的救亡協會，如教育界救亡協會之下再分設大學教職員救亡協會、中學教職員救亡協會及小學教職員救亡協會；繪畫家救亡協會之下再分設西畫家救亡協會、國畫家救亡協會及漫畫家救亡協會等是。

此外又有幾點應當加以特別說明者：

1. 現在各地文化界救亡協會既屬於各地抗敵後援會，則全國上下的縱的關係亦惟以抗敵後援會的關係為依歸，似乎文化界的組織無從發生全國的系統組織；但是在工作上亦要盡可能的使全國各地的文化組織發生密切的聯繫，然後能在抗戰中表現出極大的作用。

2. 上述所列的各部門組織，當然是就文化中心的城市而言，若在內地，文化不發達，文化人亦很少，惟有就可能的範圍之內使其有相當組織足矣，絕不能照這

樣細密的去辦。

3. 上列文化界各部門的組織，有人不免覺着分得太瑣碎了，而且有幾個部門的人員似乎是純粹學者，對於抗戰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實則不然，如果是在一個文化中心的地方，各部門的人員都有相當的數量，我們能夠就各部門的人員使他們都成立一個小的單位組織，在工作上比較大家混在一氣要便利許多。因為近代的學問，各個部門都已經成爲一種獨立的系統了。學經濟者未必能懂得教育，學化學者不見得能懂得工程。因為學問上的分門別類，文化人在平時的友誼聯絡亦即多半是在自己的同行中，所以到了戰時，利用平時彼此的友誼關係與學業上志同道合的條件，發生組織比較容易得多。至於說有幾個部門的人員似乎對於抗戰沒有多大關係，這更是淺薄之見。秉志先生說：「歐戰之時，……利用科學之處，至有不可思議者。如兵士之性情天資，有心理學家爲之測驗；偵探之四出活動，有生物採集家、地理遊歷家爲之担任；風雨氣候之變遷順逆

，有氣象學者爲之觀察；敵踪之遠近，敵方防禦之蔽護，有聲學家、光學家爲之窺探；甚至礦學家亦大肆其能力，如德人侵佔法國之北部，於最暫時期之中，大舉開發其礦產，使敵方受大量之損失，而充盈自己之實力；幾乎無時無事，不有科學家從事於其間。」（大公報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星期論文，戰時科學家之責任）這樣看來，能說那一部分人員對於抗戰沒有關係呢？

第二節 戰時文化界的工作

戰時文化界的總動員第一步當然是要有廣大的系統組織，但是有了組織而沒有工作，或雖有工作而不能分配適當，則所謂組織者仍是一個空的形式，絕不足以言總的動員。所以在抗戰期中，文化分子要想盡了自己的使命，第一步把組織完成之後，第二步便應當趕快拿工作計劃發動全部人員去實行。現在我們再就上邊所舉的組織把實際需要的工作擬定一個綱領如左：

(1) 出版界的工作：

1. 把已經出版的圖書要盡量向安全地方搬移，以免文獻的遭劫。
2. 把印刷機器向後方安全地方搬移，以便脫離戰區的危險，而能繼續出版各種需要的圖書。

3. 調節儲藏出版事業上的必需材料，如紙張、油墨、鉛條等。

4. 計劃戰時需要的各種圖書，趕快出版。

5. 與國際間的出版界發生密切聯絡，以便精神與物質上的互相幫助。

(2) 新聞界的工作：

1. 派遣大批從軍記者，傳播前線的正确消息。

2. 指示人民正確的抗戰意識。

3. 向政府建議抗戰的策略。

4. 爲民衆籌劃抗戰工作。

5. 傳播國際新聞於國內民衆。
6. 傳播國內抗戰情形於世界各國。
7. 聯絡國際間的新聞記者，使外國記者爲我國作同情的宣傳。
8. 爲程度淺薄的老百姓辦通俗小型報紙或壁報。
9. 爲前線將士辦通俗有趣且可刺激抗戰精神的小型報紙，以便送到前方與後方的軍隊中去。

10. 爲傷兵辦通俗有趣且有意義的小型報紙，以便傷兵醫院中閱讀消遣。
11. 儘可能的發行抗戰畫報以供給一般不識字的民衆看。
12. 每天要把重要新聞在電台上播送。
13. 對敵人的報紙亦加以檢查扣留，勿使流傳於民衆間。
14. 取締漢奸式的報紙與準漢奸式的報紙。
15. 將報館的一部分機器要有計劃的向後方搬移，以防長期抗戰中，萬一敵人劫奪

新聞機關。

(3) 著作家的工作：

1. 編輯戰時民衆讀物。
2. 編輯戰時軍士讀物。
3. 編輯戰時學生讀物。
4. 編輯戰時文化人的參考書。
5. 發刊各種戰時刊物。

(4) 教育界的工作：

1. 竭力維持已有的教育事業：
 - a. 戰區須設法遷移學校於安全地方。
 - b. 非戰區務須照常進行教育事業。
2. 隨時隨地創辦戰時教育事業：

a. 難民教育。

b. 傷兵教育。

c. 戰時失學兒童教育。

d. 後援工作人員訓練所。

e. 前線政治工作人員訓練所。

f. 戰時民衆常識講習所。

(5) 社會科學家的工作：

1. 研究戰時的各種社會問題。

2. 設計戰時的各種需要工作。

3. 創立戰時的各種社會事業。

4. 編著戰時需要的各種社會科學書籍。

5. 發表有關抗戰的各種論文。

6. 舉行各種有關抗戰的講演會。

(6) 自然科學家的工作：

自然科學家在戰時是最有用的人材，所以自然科學家的工作亦至爲繁重，簡直可以說任何科學家都有許多切要工作等待他來作。但是科學家在戰時的工作大概屬於技術方面者多，屬於理論方面者少，所以科學家的戰事工作與其說是文化的運動，不如說是文化的應用，比較切實。所謂技術方面的工作，其重要者如左：

1. 防毒。
2. 防空。
3. 救護。
4. 工程。
5. 交通。
6. 消防。

7. 醫藥衛生。

8. 農工業的生產。

9. 軍器的製造與修理。

7 () 文藝家的工作：

1. 創作戰爭詩歌。

2. 創作戰爭小說。

3. 寫作報告文學。

4. 編輯通俗抗戰文藝。

(8) 戲劇界的工作：

1. 劇作家創作抗戰劇本。

2. 話劇家組織劇團到各處表演：

a. 到前方為將士演；

- b. 到後方為民衆演；
- c. 到難民收容所為難民演；
- d. 到傷兵醫院為傷兵演；
- e. 到電台上用廣播的方式演；
- f. 為募捐款亦可到戲院中去演。

3. 國劇家的工作：

大體與話劇家的工作相同，惟宜偏重於募款及電台廣播的工作，因國劇劇本大概都是過去的故事，有些忠義激烈的戲劇，固然亦能激動人的感情，但與現實的問題究竟關係甚少，且音樂太噪，有些地方亦不適宜演，所以國劇界的人員應多從事籌募捐款的舞臺表演。

9. 電影界的工作：

- 1. 攝製抗戰影片。

2. 攝製戰時常識的教育影片。
3. 攝製發揚民族意識的影片。
4. 攝製敵人殘暴行為的影片。
5. 攝製戰地新聞。
6. 將以上的各種影片隨時為前方將士、後方民衆、傷兵醫院的傷兵及難民收容所的難民演出。

(10) 游藝界的工作：

將抗戰中可歌可泣的故事，用各種游藝的方式表演出來，如說書、彈唱、滑稽戲劇等事。

此種工作最宜於到下層民衆間去作，因民衆平時本以這些游藝為消遣娛樂之事，在戰時祇要把內容稍稍改變，加入抗戰的材料，便可成爲對民衆宣傳的最好材料。

(11) 繪畫家的工作：

1. 從事各種有關抗戰的圖畫。
2. 向民衆作公開的展覽。

(12) 音樂家的工作：

1. 製作救亡歌曲。
2. 組織歌詠隊：
 - a. 到前方軍隊中去歌詠，並教將士歌詠；
 - b. 到後方民衆中去歌詠，並教民衆歌詠；
 - c. 到難民收容所中去歌詠，並教難民歌詠；
 - d. 到傷兵醫院中去歌詠，以慰勞傷兵；
 - e. 到電台上作廣播的歌詠。
3. 舉行抗戰音樂會勸募捐款。

4. 用音樂鼓勵前方將士。

5. 用音樂發動後方民衆。

6. 用音樂慰勞受傷健兒。

(13) 學生界的工作：

學生的人數最多，且又都是知識青年，在文化運動中學生的作用最容易表現得出來，所以說到戰時的文化工作當然離不了學生的活動。但是學生分子一方面因為有學業的關係，一方面又因為還沒有深切的社會經驗，所以他們的工作應當與文化界各種專家的工作稍有分別。他們是對於任何文化工作都願意參加，而且亦很能吃苦耐勞去幹；但是既因學業關係不能完全為國家社會服務，又因能力地位關係，不得不需人領導，所以他們的工作應當是這樣：

1. 由新聞家指導他們辦理各種戰時報紙及刊物，如壁報及民衆閱讀之小型報紙。

2. 由教育家指導他們辦理各種戰時補習學校。

3. 由社會科學家指導他們組織各種社會問題討論會，辦理各種戰時的社會事業，從事各種戰時的宣傳講演。

4. 由自然科學家指導理科的學生從事戰時的各種技術工作。

5. 加入各種劇團當演員。

6. 加入各種歌詠團體到各處歌詠。

7. 隨時隨地作宣傳的工作。

總之，學生是民衆中的知識分子，可說是文化專家與一般民衆的中間人，要想使文化工作深入民間，非發動全體學生不行。但這是指中等以上的學生而言，至於小學生因爲年齡太小，我們不應責望他們來担任工作。

以上所說的戰時文化界的組織及其工作，當然不足以言詳盡，亦不能說就是一定不可變易的辦法，不過舉其原則大綱以便從事文化工作者之參考而已。總之，所謂文化人的總

動員者，即要使全體文化分子都加入組織之中，都有工作擔任，而所謂工作又都要與抗戰有密切的關係而已。

第四章 到民間去

都市文化與鄉村文化的不平衡發展，這可說是中國近年來文化發展上的一個大缺點，亦可說是近年來中國文化運動者的一個大失敗。一個國家的文化，本來是一國國民的生活表現，而所謂文化運動亦即是以提高國民的知識，改善國民的生活為其主要目的。假若文化而不能大衆化，則所謂文化者仍不過是一部分文人學士的專有物，與一部分有閒分子的娛樂品，根本已失文化的價值，又何必來從事運動。但是不幸中國近年來的文化運動其成績正是這樣。我們看：都市裏的文化一天比一天發展，鄉村間的文化則一天比一天衰落；都市裏的大學設立了許多，而鄉村間的小學則至今還沒有完全普及；都市裏的文人大談主義，而鄉村間的人民則十之七八仍爲文盲；都市裏的文人口口聲聲國際世界，而鄉村間的

民衆則連民族國家亦不認識；都市裏的人們住洋房吃大菜，而鄉村間的民衆則連最低限度的衣食都成問題；總之，一切文化上的現象都是一種畸形的表現。

現在，一個非常嚴重的時期到了，全面抗戰已經是發動了，廣大民衆的力量是成爲爭取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了，而多年來文化運動的缺點與失敗亦大爲顯露了。因爲文化運動本來是覺醒民衆意識、提高民衆程度、發動民衆組織、指導民衆工作的一種工作，我們的文化運動既已有過很長的期間，那末到了此時，我們便應當從事實上一看：民衆的意識是否已經覺醒？民衆的程度是否已經提高？民衆的組織是否已經嚴密鞏固？民衆的抗戰精神是否已經充分表現出來？質言之，即我們此時的民衆是否夠得上全民抗戰期中的民衆資格？一經這樣的考問，事實的答覆是很難合於我們的期望。所以近來許多熱心抗戰工作的人士，都感覺此次抗戰的缺點，即後方民衆的力量表現不足，前線將士在作戰上所感覺的最大困難，亦是民衆與武力不能打成一片。寇深矣！禍急矣！若不及早圖之，則此次抗戰祇能說是全軍抗戰，絕不足以言全民抗戰。在這樣一個非常嚴重的生死關頭中，若仍把民族

國家的責任完全由軍人來擔當，而其他許多民衆則袖身旁觀，或逃避躲藏，或甚至爲敵作假擾亂後方，這雖然是民衆本身的罪惡與政府當局的過失，而亦實爲文化人士的大恥辱。因爲所謂文化分子者，就是民衆中的先知先覺，「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以斯道而覺斯民，」本爲古來文化分子的唯一使命，今大喊了文化運動二三十年，而我們的民衆還是對於自己的民族國家沒有認識，對於現代國民應有的一點公民常識還是毫無所知，對於非常時期國民應盡的責任義務不知實行，不能實行，或甚至不願實行，這豈不是文化分子多年的工作，根本沒有做到「以斯道覺斯民」的原因嗎？我們若再推究文化分子平時的工作，所以不能作到「以斯道覺斯民」的原因，則是由於所謂文化分子平時與民衆太不接近。爲甚麼文化分子與民衆不接近？因爲他們平時都是住在都市中，而根本不願意到鄉村中去，所以我們現在如果要使文化運動在全民抗戰中克盡他的偉大使命，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發動多數的文化人到民間去！

好！現在的一切環境，已經和平時不同了。平時都市是繁華世界，戰時的都市已經成

爲荒涼區域了；平時都市是極安樂的地方，戰時的都市已經成爲敵人轟炸的目標了；平時的都市的交通是發達的，戰時的都市交通是最感困難了；平時都市是文化人最易謀生的地方，戰時的都市則成爲文化人謀生最感困難的地方了。因爲都市環境的今昔不同，所以自從抗戰發動以來，雖住在都市裏多年不動的文化人亦不得不向內地移動了。所以乘此時機發動多數文化人到民間去工作，不祇是客觀事實上的急切需要，而且亦是文化人本身的一條正當出路。

第一節 民間工作的綱要

到民間去怎樣工作呢？我們以爲應當這樣：

(一) 覺醒民衆意識；

(1) 使民衆瞭解人民與國家的關係；

(2) 使民衆瞭解目前民族國家的危急狀況；

(3) 使民衆瞭解敵人侵略我國的最後目的；

(4) 使民衆感覺亡國之後的痛苦；

(5) 使民衆認識這次抗戰對於國家人民的重要關係；

(6) 使民衆知道要想打退敵人，必須全國人民一致起來參加抗戰工作；

(7) 使民衆知道要長期抵抗敵人，必定要受到相當痛苦，而這種痛苦是我們爲了本身的將來幸福與子孫的永遠享福應當暫時忍受的。

(二) 提高民衆程度：

(1) 提倡識字運動，肅清文盲；

(2) 灌輸公民知識，使民衆都有近代國民的資格；

(3) 灌輸戰時常識，使民衆都能應付非常時期的生活；

(4) 灌輸國際知識，使民衆瞭解世界大勢；

(5) 灌輸生產知識，訓練生產技術，使民衆增加生產能力；

(6) 灌輸現代社會科學常識，肅清民衆的封建意識；

(7) 灌輸自然科學常識，使民衆認識現代文明，享受現代文明。

(三) 發動民衆組織：

(1) 使民衆努力保甲運動；

(2) 使民衆組織各種職業團體，如農會、工會、商會等；

(3) 使民衆組織各種戰時需要的團體，如抗敵後援會、戰時服務團、救濟會

護團、肅清漢奸隊等；

(4) 使民衆組織各種合作社，如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

(5) 使民衆瞭解民權主義，養成民主思想，以便將來參與民主政治；

(6) 使民衆的戰時組織與軍隊配合一致，以期武力與民衆打成一片。

(四) 指導民衆工作：

(1) 指導民衆安定後方秩序；

(2) 指導民衆肅清漢奸；

(3) 指導民衆從事各種戰時的必需工作，如防毒、防空、救濟、避難、慰勞、救護、消防、運輸、保護交通、建築工程、偵察敵情等事。

(4) 指導民衆關於普通生活的工作，如生產、存儲、流轉、調劑、節縮等事。

(五) 改善民衆生活：

全民抗戰如果時間延長下去，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的生產一定要受到極大損失，因之人民的生活亦惟有一天比一天更加困難，甚至有一部分人民連平時的一種最低限度生活亦恐難以維持，那裏還能再談到生活的改善？但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文化與經濟是自古以來不能分離的。所以我們在平時要到民間去從事文化工作，第一要件當然是要把民衆的生活盡量改善，能把民衆生活改善，民衆對於文化人纔能發生信仰，纔能感覺到文化的利益。到了戰時，當然不能與平時一樣，但是在戰時的生活狀況之下，亦並不是絕不能使民衆生活改善；反之，因為戰時的民衆容易

成爲流離顛沛的狀況，正有許多處是需要有知識的人士來替他們設法改善。舉其最顯著者如下：

- (1) 戰區難民的救濟；
- (2) 戰時民衆的衛生設備；
- (3) 防止各地土豪劣紳藉戰時工作欺壓人民；
- (4) 防止各地盜匪乘火打劫；
- (5) 防止各種漢奸毒害人民；
- (6) 調節人民日常生活必需的各種物品；
- (7) 使人民改除平時的各種腐敗惡習。

第二節 民間工作的方法

以上我們把文化人到民間去的工作大綱舉出了，至如何實現這些工作，又應當用這

當的方法。方法爲何？即：

第一、文字宣傳：

- 1 定期刊物
- 2 日報
- 3 傳單
- 4 壁報壁畫
- 5 漫畫
- 6 照片電影
- 7 畫報
- 8 小說
- 9 連環圖畫
- 10 標語
- 11 宣傳車遊行

上列各項文字宣傳，須用淺顯語體文，尤其要多利用圖畫。定期刊物頁數不宜多，發行須普遍。壁報、壁畫、漫畫、畫報最好用彩色，普遍張貼。小說，須搜集愛國史、亡國史、及敵人殘酷史蹟。連環畫須將舊有的加以檢定統制，並新加編印適應抗戰需要的。標語除普遍粘貼外，須注意交通要道之路牌牆壁，並張掛大布，用文字圖畫，使人注目（參照軍委會抗敵標語彙編）。宣傳車攜備各種宣傳品，遊行市鄉，並口頭講解。

第二、口頭宣傳：

- 1 演講
- 2 話劇
- 3 說書
- 4 播音

5 游藝雜耍

6 談話

7 歌詠

8 訓練班

上開各項口頭宣傳，須注意對象的生活狀況和情緒要求，由其本身利害談到國家大計。演講隊須普遍，戶內戶外並行。談話方式須有變化，如在茶坊酒肆報告脫教，或用免費代筆寫信爲媒介，巡行市鄉，隨時隨地將戰地情形，戰時題材，爲啓蒙的解釋，使民衆明瞭國策，明瞭仇人所受的一切苦難，均爲日本軍閥侵略我國的結果。話劇、說書、游藝、雜耍，均須爲流動性質，在各地巡迴。游藝、雜耍的種類，爲大鼓、滑稽、獨脚戲、雙簧、化裝蘇灘、申曲等等，最好利用失業游藝界人，編成沿街及下鄉宣傳隊，以各種原有民衆娛樂方式，流動宣傳。歌詠隊及訓練班，須普遍設立，灌輸戰事常識及防奸方法。

第三、教育宣傳：

- 1 利用失業知識分子及學生，成立戰時教育速成班，掃除文盲，宣傳抗戰。
- 2 編印國民戰時常識課本，通令各校教授。

3 學校多辦民衆義務夜班，由學生教導宣傳。

4 令學生：（1）舉行週會，輪流報告時事，並討論工作；（2）課餘時間，推行社會及農村宣傳；（3）課餘時間，推行民衆教育，灌輸救國思想；（4）專科以上學生，各就本科範圍內設立各種技術研究會。

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曾國藩說：「風俗之厚薄何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這些話雖然不能完全作爲我們文化運動的原則來看，但是由此我們可以相信，如果文化人能夠到民間去，出一身血汗去教育民衆，比在都市裏著書寫文章所生的影響，一定是更爲廣大，更爲切實。所以我們說，在全民抗戰期中，文化人要發揮他的能力，完成他的使命，惟有趕快到民間去！

第五章 戰時的幾種特殊文化工作

平時的文化工作是以一般人民爲對象，戰時的文化工作，主要的對象當然亦是一般人民，因爲祇要能把一般人民的意識喚醒，程度提高，組織健全，工作推動，則民衆的力量可以完全表現了，文化工作的使命可以說完成大半了。但是到了戰時，一般人民之外又有許多特殊的人民產生，於是文化工作的對象亦不能不於一般人民之外更注意許多的特殊人民，對於這許多特殊人民所作的文化工作，便可名爲戰時的特殊文化工作。所謂戰時的特殊人民是些甚麼人？即難民、流浪兒童、前線兵士、後方傷兵、不幸而陷入敵人勢力之下的老百姓等都是，甚至被俘擄的敵人，雖不能說是我國的人民，但亦應當對他們加一番文化的工作。對於這些人的文化工作應當怎樣作呢？茲略舉綱領如左：

(一)對難民的工作 戰事發生後，有許多平時安居樂業的人民，馬上變成無家可歸，顛沛流離的難民了。對於這些人的處理，第一步當然是要實行救濟，使他們不至凍餓而死。但是救濟的工作若僅是給他們有住處，有飯吃，有衣穿，不過僅僅的是救濟了他們身體上的痛苦，而並不能救濟了他們精神上的痛苦。我們要知道難民的身體因為無衣無食固然是感受極大的痛苦，而難民的精神因為家破人亡更是遭受了極大的刺激。因此對於這些可憐的難民，除了政府機關與慈善團體實行物質上的救濟外，文化人更應當拿出一點精神食糧來救濟他們的苦痛心理。這些人在平時或因生活忙迫無機會領受教育，或因生活固定不感覺知識的需要，或因頑固習性已養成，根本對於一切新知識不感覺興趣；現在住到難民收容所想為生活忙碌亦不能了，境况完全變化處處需要知識了，創巨痛深之際頑固的習性亦當可以減去不少了。我們知道所謂「困而不學」的人究竟是很少的，所以文化人正可利用他們「困心衡慮」「動心忍性」的時候施以相當教育：

！使他們明瞭國家抗戰的真義；

- 2 使他們得到戰時應有常識；
- 3 使他們學習戰時服務的技術；
- 4 使他們學習生產技能；
- 5 使他們認識國家與人民的關係；
- 6 使他們意志加強，忍受抗戰期中的一切痛苦。

(二)對流浪兒童的工作 流浪兒童似乎就是難民中的一部分，即小難民，但是我們此處所說的流浪兒童不是僅限於難民收容所的兒童，而是指在戰時失學的一切兒童而言。因為戰時發生之後，真正難民的兒童住到難民收容所中還不見得流浪，許多還沒有作為難民的兒童因經濟困難不能繼續入學讀書，或因為學校遷移停頓，根本無適當學校可入，倒反而是成為流浪的生活了。這種兒童即幸而身體不至流浪，而精神，已經是流浪了。兒童是國家的將來主人，我們當然不能看他們流浪而不設法救濟，因此又得文化人出來服務了：

- 1 編印兒童讀物供給兒童在家閱讀；

2 訓練家庭教師派到各家庭去教兒童；

3 就兒童的住處辦臨時小學；

4 指導兒童父母從事家庭教育。

(三)對前線兵士的工作 前線兵士之衝鋒肉搏，不祇是需要有強壯的體力，而且需要有堅定的意志與熱烈的感情。強壯的體力固然是已經在平時養成，而要有堅定的意志與熱烈的感情則又須時時給他們一種精神上的鼓勵。這種工作軍隊官長當然是不會放鬆的，但是文化人亦應當受軍隊官長的指揮而從旁加以協助，即所謂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亦即近年來政治訓練處所作的工作。此種工作應由軍事機關作計劃而文化人受指揮去工作，不能由文化人自己作計劃。

(四)對後方傷兵的工作 對後方傷兵的工作即可說傷兵教育。傷兵中的重傷者當然不更應以教育，其輕傷者一時既不能再上前線，而睡到醫院又無多大痛苦，所以除醫生與看護人應當為他們盡心治療外，文化人更應當給他們一種適當教育，如：

1 講述民族英雄故事；

2 講讀重要新聞；

3 開演有意義的電影；

4 歌詠救亡歌曲；

5 代寫書信。

(五)對淪陷區民衆的工作 披戰以來敵人已經是侵佔了我們的許多領土，在這些已失的領土上有我們的許多老百姓是吞聲飲泣於鐵蹄之下，過一種非人的生活。他們的身體雖然是受敵人的壓迫了，而他們的心理絕不甘心受敵人的支配；他們的眼睛雖然看不見青天白日旗了，而他們的腦中則永遠不會忘掉中華民國。因此，我們的武力雖然暫時不能保護他們，我們的政治雖然暫時不能和他們發生關係，但是他們與我們的精神聯繫，則無論如何不應讓敵人來割斷。質言之，即無論如何，不應讓敵人把我們這一部分同胞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消滅。因為人心不死，失去的土地總有收復之一日。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

惟有文化人用秘密的方法，從事工作而已。此種工作很難舉出具體事項，而亦不便舉出，所可言者，即：

- 1 態度要穩健，方法要秘密。
- 2 撒播復興種子，埋伏抗敵勢力。
- 3 效法滿清入關以後，漢族志士反清復明的工作方式。
- 4 效法滿清末年同盟會會員宣傳革命的方式。

(六)對俘虜的工作 敵人既成爲俘虜，當然我們不必再用武力對付他了，而文化的工作倒是很需要了。我們應當用種種的方法使他認識我們的正義人道，明白他們軍閥的殘暴罪惡，待其徹底覺悟之後，或縱之使返敵陣，或送其繞道返國，他們一定可以在兵士間或人民間作有利於我們的宣傳；至少他們亦不至再被他們的軍閥永遠欺騙麻醉了，這種工作如果作得好，他們或許能成爲擾亂敵人後方的導火線亦未可知。這種工作是轉變意識改造思想的工作，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工作，非強迫手段所能爲，亦非虛僞方法所能行，惟有

用感化的態度然後可以使其心悅誠服，於是這種特殊工作亦就成爲文化人的一種特殊工作了。

總之，文化工作是一種「任重而道遠」的工作；在平常時期有平常的工作，在非常時期更有非常的工作；對一般人民有一般的使命，對特殊羣衆更有特殊的使命；對自己人民有正面的工作，對俘虜敵人又有反面的工作；戰爭勝利，新收復的領土需要工作，不幸爲戰略關係暫時放棄了的地方更需要工作。孔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我們今日亦可說「文化人不可以不弘也。」

第六章 戰鬥的工作與研究的工作

在全民抗戰期中，要發動全文化界的總動員，當然是要把文化人都編入文化戰線之中，使他們都參與一種文化的戰鬥工作。但是文化人中有一部作純粹專門研究的學者，或因研究的東西離開現實問題太遠，一時沒有適宜的工作，使他們擔任；或因多年精力完全集中於一個狹小的範圍研究，一時不能拿別的事情牽動他的心思；或因生活習慣的關係祇能作靜的研究，而不能作動的事情；那末又應當怎樣辦呢？

我們以為所謂戰時文化界的總動員者正如戰時軍隊的總動員一樣。軍隊的總動員既不是立刻把全部軍隊都開到前線上去，文化界的總動員亦不是馬上使全體文化人都參與戰鬥的工作。反之，如果是要長期的抵抗敵人，一方固然需要大批的文化戰士去從事具體的救

亡工作，一方面尤需要少數的專門學者來埋頭作深刻的學術研究。因為文化運動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使文化的發展普及，一方面尤其是要使文化的水準提高；一方面是要注意目前實際的應用，一方面尤其要顧慮到永遠基礎的奠定；要使文化發展普及與目前實際上有所應用，當然是文化鬪士之責；要使文化水準提高，永遠的基礎得以奠定，則非有專門學者不行了。

近代的戰爭毫無疑義的是一種文化戰爭，在兩國交戰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出：誰的文化發展普及，誰的國民戰線就鞏固；誰的文化水準高，誰的作戰能力就強。我們這次抗戰中所表現的缺點，第一是國民的組織渙散，第二是軍事上的器械缺乏，前者是由於文化的發展尚未能普及，後者則是由於文化的水準未曾提高。所以我們現在雖然已經到了戰時，對於提高文化水準的工作有點覺着緩不救急，然而我們如果要想長期的抗戰，要想抗戰得到最後的勝利，要想使我們的民族國家經過此次奮鬥而在世界上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則除了趕快努力於文化普及的工作以外，更應當不要遺忘了提高文化水準的工作。於是一部

分真正作純粹專門研究的學者，如果是事實上暫時不需要他們參加具體的救亡工作，或是他們不能參加，則我們正不必勉強他們參加；而他們自己亦不必放棄了自己的工作勉強來參加。因為所謂作純粹專門研究的學者，一個國家亦不過是很少的幾個人，在國家看他們正如鳳毛麟角之可貴，在他們個人亦自有對國家貢獻之事，正不必使他們捨其所能為而強其所不能為，以致得不償失也。莎斯比亞一人的價值可以當一個印度的全部領土，愛迪生一生的發明可以補償美國在歐洲中的損失幾倍，我們應當拿這樣的眼光來期待從事專門研究的學者，而從事專門研究的學者亦應當以這種責任自負。

曾記得中國考古學者李濟有一段話說：

「一九一八國難發生後，我們常常自問：我們這種工作，在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中，是否一種浪費？我們雖並不懊悔我們職業選擇的荒唐，但那放下劍子抗鎗赴前敵去打仗的衝動是免不了的，並且是很強烈的。記得英國埃及學家裴居離爵士在歐戰期間亦經過這種心境，但是他的志願始終沒有具體化。現在我們既然尚沒有機會表現我們

這類的志願，祇有繼續我們原來的工作。（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估計五六九頁）

這段話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說的，當時「九一八」事變是過去了，「一二八」事變亦結束了，所以他說「現在我們既然尚沒有機會表現我們這類的志願，祇有繼續我們原來的工作。」現在全面抗戰已經發動幾個月了，李濟先生所說的「表現志願的機會」是已經到了，但是我想如李濟先生以及其他從事專門研究的學者，國家亦還不至於就需要他們「抗鎗赴前敵去打仗」，但是因為環境的不安使他們不能照常工作，因為國家的危急使他們發生抗敵禦侮的衝動，因而對於自己的工作與目前的需要感覺發生矛盾，則確是大有人在。

此時國家既不至需要專門研究的學者「抗鎗赴前敵去打仗」，而所謂專門研究的學者事實上亦不見得就能「抗鎗赴前敵去打仗」，那末這些人應當怎樣工作？應當作些甚麼？曰，仍惟有從事文化工作而已。但是文化的戰鬥工作亦不是這些人的擅長，勉強去作又不免得不償失，那末又應當怎樣？曰，仍惟有從事專門研究，努力提高國家的文化水準而已。

當一八〇六年拿破崙率領法國軍隊攻打普魯士時，人文會萃的般堡 (Bamberg) 被焚燬了，學術中心的耶那 (Jena) 大學被停頓解散了，而大哲學家黑格兒 (Hegel) 則鎮靜如常，仍從事其精神現象一書的著作。後來法國軍隊擾及黑格兒的家庭，黑格兒攜其著作稿出奔，猶很自信的說：「我的著作不失，德國終有復興之日。」果然黑格兒的思想影響，形成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六七十年以後，德國便又一躍而成世界第一等強國了。又當一八一三年來比錫 (Leipzig) 戰爭未發時，德國局面已是處於極度緊張的時候，而歌德 (Goethe) 則放棄一切，從事研究中國的學術，所以他的大著浮士德 (Faust) 一書中頗有東方思想的表露。今日的時代當然與十九世紀初年的時代不同，此次的中日衝突亦和當年普法的戰爭不見得一樣，我們亦不能說是叫中國的學者在此時都學百年以前的黑格兒與歌德；但是如果少數的專門學者限於種種關係不能參與戰時的具體文化工作，則學黑格兒與歌德的精神，為民族國家奠定永久的文化基礎，實在是國家政府所希望，而全體人民所景仰的。他們埋頭研究的工作，亦正可與文化戰士奔走呼號的功勞一樣看待。我們不應當

把這些人看成是逃脫文化戰線，而我們應當把他們看成是坐鎮文化戰線者

當然這樣的人是僅有很少數的，大多的文化人還是應當走上文化戰線的前線上去！

第七章 戰時文化運動的困難及其補救方法

戰爭是一種極端破壞的行爲，敵人的野蠻侵略，固然是到處實行蹂躪，就是我們的正義抵抗，亦不免有所破壞，所以戰事一經發動，社會狀態即入於非常時期了。在非常時期中各種事業都要感受困難，而文化工作的困難問題更多，茲列舉如下：

第一、文化工作需要文化工具，而戰事發動後文化工具的供給即感受極大的困難，例如書籍、新聞、雜誌，以及一切宣傳品都不能不用紙，但是近年來中國所用的紙大概都是仰給於外國，戰事起後，外國紙不容易運到，中國自己造的紙又不敷應用，而許多書店報館所存的紙，或是陷於戰區不能搬出，或甚至已被敵人損毀。又如印刷機器亦是文化工作的重要工具，但是在戰時，或因陷於戰區被敵人損壞，或因電力缺乏不能充分使用，在文

化工作上都是一個極大的打擊。此外各學校的圖書，試驗室的儀器材料，以及印刷必需的油墨鉛條等物，一到戰時都要感受極大困難。總之，一至非常時期，凡文化工作所需要的東西無不感受困難，戰區如此，非戰區亦不能如平時的供給便利。

第二、文化之傳播需要交通，戰事發動後交通一定要發生許多阻礙。所以自從抗戰發動以來因為交通不便，都市裏的書報不能運送到內地，內地的消息不能傳達到都市，於是本來在平時都市與鄉村的文化即為一種不平衡的狀態，到了非常時期，簡直都市文化與鄉村文化完全成爲隔絕的樣子了。鄉村的人士每日感覺精神上的饑荒，引領而望都市裏文化分子供給他們一點精神上的食糧；都市裏的文化分子亦深感覺這種事實上的需要，急想把自己的產物輸送到後方的廣大民衆間去；但是交通的工具被敵人炸壞了，運送的工作無法進行了，於是多少停留在都市裏的文化戰士與他們所產生的許多精神武器，一齊都等於封鎖在一個孤島上了。這確是戰時文化運動上的一大問題。

第三、文化的建設需要社會秩序安定，而戰事發生之後，則無論前方或後方，社會秩

序絕不能如平時安定。因為社會秩序不能安定，所以作文化工作對象的人民羣衆亦即成爲流動變化的狀態了。例如學校學生，自從全面抗戰發動以來，在戰區者大多數是無學校可入了，不在戰區者亦因經濟的關係而無從讀書了。又如近年來各地所有的民衆教育機關，在平時總有許多民衆按照一定的時刻去閱書報或聽講演，但是到了戰時，戰區內的民衆當然都成爲難民而流離失所了，即在非戰區者，因爲大家要服務後方工作，亦都忙得日夜不能安靜休息了。因此民衆教育館平日工作的對象到了此時亦大成問題了。此外如人民的遷徙無定以致影響新聞雜誌之訂戶，人民之生活困難以致無力購買書報，這都可說是文化工作的困難問題。

第四、是關於文化人的工作與生活問題。工作與生活本來是有密切關係的，有工作的人當然可以解決了生活問題，要解決生活問題必須要擔任工作，這可說是天經地義的道理。但是工作與生活有時亦會發生矛盾問題，尤其是到了非常時期，要想爲解決生活問題而找工作，大多數的人是不見得能夠找到，反之參加工作的人亦不見得就能解決生活問題。

這種情形在抗戰起後數月來已經是很明顯的事實，而文化界的分子對於這種問題，更感覺的特別嚴重。因為文化分子本來不是直接生產者，平時或憑教書拿點薪水，或憑寫文章拿點稿費，還可勉強維持生活；到了戰時，有許多學校是陷於戰區不能開學，即在非戰區的學校亦因經費困難不能如平時的辦法供給教員，因此教育界的人士當然在生活上是發生問題了；至於寫文賣稿的人們，則書店停止收稿，報紙雜誌縮小篇幅，當然是更不能指望解決生活問題了。戰時的文化工作固然需要許多的文化人來參加，但是在救國的工作中絕不能說到解決生活的問題。因此有些文化人因為吃不下苦而退縮不前，有些人則因為家庭衣食問題所逼而表示消極，這樣文化工作的人員當然要減少很多，而文化運動的力量亦即不能充分表現，這不能不說是戰時文化運動的一大問題。

以上所舉的四個問題都是在戰時文化運動必然要發生的，所以抗戰還不過三月，這些問題都已經很明顯的擺在我們眼前了，至於其他比較小的問題更不知有多少。但是我們絕不應讓問題把我們困住，反之，我們更應當打破一切困難，積極努力文化運動。那末對於

以上所舉的幾個困難如何補救呢？我們以為應當這樣：

一、關於文化工具的缺乏問題，應當一方面想法至後方製造，一方面從事文化工作的人要竭力節省。後方製造的事情應由政府與各大文化機關合力進行，儉省使用的方法則需要文化界有嚴密的組織來從事適當的調節。例如紙張問題，非戰時必需的印刷物可以暫時不印，性質相同的印刷物可以設法合併，這樣有計劃的配合便可省下許多的浪費。

二、關於因交通阻礙而致文化傳播不便的問題，我們應當把各種文化機關除留下一部分都市必需者外，盡量向內地搬移，而都市上所出的書報亦應當允許內地翻印轉錄，這樣便可減少都市文化與鄉村文化隔絕的弊病。

三、關於民衆在戰時流動變遷的問題，我們以為從事文化工作的人亦應當隨民衆而流動變遷。我們要把民衆看為主體而把從事文化工作的人看為客體，要使文化人遷就民衆，不應當使民衆遷就文化人。所以祇要從事文化工作的人能夠因時因地因人而想法應付，絕無困難問題。

四、關於文化人的生活問題，我們覺着一方面可以由政府來作通盤的籌劃，一方面文化人亦應拿出點刻苦的精神來。全民抗戰，當然不能祇憑軍事，而是需要全體民衆動員，要使全體民衆動員，則必須有廣大的宣傳與指導，而對民衆的宣傳與指導則需要大批的文化人，所以政府應當對於文化人的工作看爲與前線將士的作戰一樣重要，而作一種通盤籌劃，最低限度要使他們的工作與生活不發生矛盾。同時文化人亦應拿出刻苦的精神，抱定服務的觀念，祇求工作與生活不發生矛盾問題已足，絕不應再求生活舒適，亦不應存下一個爲解決生活而工作的心理。

關於戰時文化運動的困難問題，除以上所舉者當然還多，而解決困難問題的方法亦不必盡如以上所言，要在我們隨時隨地打破困難環境以求文化運動與武力抗戰配合一致，而完成全民抗戰的勝利條件而已。孔子說：「知其不可爲而爲之」，戰時從事工作的人員都應拿這樣的精神來幹！

第八章 戰時文化人的態度問題

在全國抗戰的大時代中，文化人既擔負有極重大的使命，於是文化人的態度問題應當加以注意，因為一個人的態度得當，然後在工作上容易表現成績，在羣衆中容易發生影響。那末戰時文化人的態度應當怎樣才對？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第一、應竭力免除文人相輕的習氣。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到了現代，更加顯著。所以在平時，報章雜誌上的筆戰，可說完全是意氣之爭，真正爲真理而爭論的可說百不得一。甚有連意氣之爭亦說不上，祇是爲吸引羣衆注意，故意互相打筆墨官司的。這種現象簡直不祇是文人相輕，而且是文化遊戲了。這種態度當然不是真正從事文化運動的人所應有的。但是在平常的時候至多浪費他們個人的時間與損傷一部分讀者的精神而已；假若到了

戰時，所謂文化人者仍舊拿這種文人相輕的態度來從事救亡的工作，那就不免要破壞文化戰線，擾亂民衆視聽，影響所及，其危險將有不堪設想的了。所以我們以爲凡屬文化分子到了戰時應當竭力免除文人相輕的惡習，大家站到一條戰線上，爲一個共同目標而埋頭工作。平時儘管有學術派別的不同，政治見解的不同，以及個人彼此之間的意見不同，到了這個非常嚴重的時期，都應當一齊泯除而爲民族國家來工作。

第二、應當改去空談而不實行的毛病。自古文人都是長於空談而不善於實行，所以談起話來頭頭是道，提起筆來連篇累牘，但是作起事來，則或不負責任，或固執私見，其結果必一無所成，或憤事累人，這確是文人的一大缺點。本來理論是由事實而生，理論能實行於事實才能算是真理。所以自從近代社會科學成立以來，一切離開實踐的理論都已沒有科學的價值了，但是在平常時候，一部分文學者專尚空談，這不過祇是他個人本身學問上的毛病；若到了非常時期，要從事抗敵救國的工作，仍然是不能改去此種毛病，則勢必至於清談誤國，流爲「宋人議論未定，而金兵已經渡河」的事實。所以我們文化人在戰時的

態度應當是「說得到做得出」，不應當是說幾句不負責任的話，作兩篇不切實用的文章，博得一點救國虛名，就算了事。

第三、應當肅清士大夫階級的腐敗心理。中國舊日無所謂文化界，所謂士大夫就是文化分子。現在的文化分子當然與舊日的士大夫不同了，但是因為多少年來的傳統精神，未能一時除盡，於是今日自命為新文化界的人士仍有很濃厚的士大夫習氣附在他們的身上。他們自視為有知識的人，對於無知識的民衆常存一種輕視的心理；他們自視為有地位的人，把一般普通民衆都看成是應當受他們支配的人；他們要生活優美，要名位高尚，於是投機取巧，患得患失，到了民族危急的時候還要爭名，到了國家將亡的時候還要顯官，名為指導民衆，而實欺騙民衆，名為代民衆謀利益，而實假民衆以謀自圖。這一切一切的腐敗現象，我們固不敢說凡文化人都如此；但是假若一個自命為新文化分子者而仍有這種舊士大夫階級的惡習，則我們可以說無論如何不能從事文化運動，尤其是不能從事戰時的文化運動。因為所謂文化工作在平時本來就是一種極清苦的事情，到了戰時尤其是犧牲多而利

益少，如果不能肅清舊日士大夫階級所有的各種腐敗心理，這種工作是絕對不能担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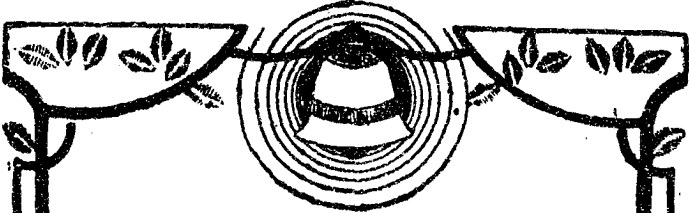
以上所舉三點是在消極方面應當加以改正的。除此以外，在積極方面應當有一種適當的態度，所謂適當的態度，應當是這樣：

一、生活平民化 文化人本是平民，他所從事的工作亦是平民的工作，他的最大使命就是教育平民影響平民與領導平民。要完成他的使命，便不得不深入平民隊中去活動；要到平民隊中去活動，在生活上便不應該自居爲特殊階級而享受與平民不同的生活。尤其是到了非常時期，要從事非常工作，更應當具有一種咬得菜根的精神。

二、思想統一化 思想本是自由發展的，文化人的思想尤其是富於自由性的，而所謂文化運動，亦是以爭求人類思想的自由解放爲最大目的。但是在我們的民族國家被敵人壓迫得毫無一點自由的時候，我們便應當犧牲個人的自由而先爭求民族國家的自由。要爭求民族國家的自由，則各種文化人都應站到一條陣線上，祇有一個信仰。文化人的各種活動都應當一致，要作到這種地步，文化人的思想便應當首先統一化。

三、工作戰鬪化 文化人的工作本是一種從容和平的工作，一部著作可以寫上幾十年，一篇文章可以作上幾個月，一句話可以經過再三考慮而後慎重說出，這確是文化人的特殊態度，亦就是文化工作之所以成功難而影響深的原故，所以我們對於文化人的這種慎重態度當然是要當作一種美德來看。但是到了戰時要參加救亡工作，這種態度便不能不因非常時期的境環而稍為改變一下。因為戰時的各種文化工作研究的成分少而宣傳的成分多，研究的工作是需要理知的分析，而宣傳的工作則是需要感情的煽動，所以我們在戰時從事文化運動，無論是文字的論說或口頭的講演都應當表示出一種戰鬪的精神，然後可以喚起民衆參加抗戰禦侮的工作。

總之，文化工作是一種羣衆工作，文化人要想在廣大的羣衆中發生影響，不祇是要露說，而且還要能作；不祇是要說得好，而且還要作得好；要想作得好，就不得不把態度改善。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戰時文化運動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一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

編著者 陳高鏞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030)

64

752702

752702



0.15 元